

□ 我与清华

随着 2013 年孙子上清华附小，我“爷随孙动”，重返清华园，过着忙家务、伴儿孙、享天年的幸福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处于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我的能力有限，既不是大有作为，也不是无所作为，大概算有点作为。

我本田舍郎，有幸上学堂。欲走成功路，厚德加自强。

上面这首《清华情》的打油诗最能反映我感恩清华的内心情感。我想，这也是清华人成功的秘诀，也是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的传家宝。

人生沉浮录

○张哲荪 (1957 机械)



1955 年春天，张哲荪学长在清华二校门前留影

我从来不打扑克，不下棋；幼年去过北京城内的公园，上清华大学时只去过颐和园；五年大学的大三、大四都未回天津的家过春节；有时一学期也不出校门。一则缺钱，二则只想在校中多学习，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不找事，可是事找我。碰上了同学谢某某考试作弊这样的倒霉事，本来是向不良现象做斗争，却演变成了“反党”，被打成“右派”，下沉到人生谷底。

从清华走出，虽然每一步都要付出比平常人多几倍的艰辛，但还是一步一个台阶地上浮到人生的高端。

被错划右派

我本左派，1955 年入团前就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入团后还想申请入党，但却遭遇命运捉弄。我们机械制造系制 7 班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谢某某考试长期作弊，被我们新斋 834 室同学发现，相对于开会时他的政治说教，一副伪君子两面派，我们同屋 5 位同学都很义愤。商议后，多次向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举报，都答复“不可能”。按照党的教导，我和同屋同学黄岚影上告到校党委副书记处。在大五上学期末最后一次考试时，把谢某某当场夹带作弊小抄抓了现行。谢某某受了留校查看和留党查看处分。但是，我们还是因此得罪了人。

1957 年 5 月 24 日，清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那天午睡时，有位同学到我们 834 室商议写大字报，但我没有去写。后被定为右派组织的学生会毕业生分会成立

时，有同学叫我去参加，我也没去。反对学习苏联作毕业设计，讨论会上我发言说“这是花100元钱买了一个苹果”。到反右时，这些成了“反党言行”。于1957年夏毕业前，被错划为右派。

《蒋南翔传》中写道：“清华大学的反右派斗争造成一大批师生和他们的亲属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我深深地感到对我全身心的政治迫害，甚至性格都由活泼变得孤僻。

到一重工作

打成右派后，毕业分配工作，幸亏参加分配毕业生工作的池去病老师对我学习成绩的肯定，才得以分配到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一机部最大的重点厂，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该厂现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是5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到一重后，不许我接触保密资料，只能搞基建，做编制机电设备安装预算的工作。做了这份工作，我阅读了全厂4800多台套全部设备的图纸资料，使我的技术知识面扩大到了特大型机械厂的全部。我多次对苏联设计的非标准设备提出减小设备重量和造价的建议，根据合理化建议奖励办法，多次获得奖励，最多的一次150多元，最少的一次40多元。

1958年初，一机部基建局下达指示，要求一重对全厂建设的工业炉编制一本资料。于是，我整理了全厂220台、70种工业炉的全部数据汇编成册，定名为《工业炉技术经济指标》，提供给国家机关、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用于设计和编制概预算的参考。虽然署名“第一重型机器厂



2012年校庆，张哲荪学长（右）携夫人返校参加入学60周年活动，与同学张孝文合影

基本建设处编制”，但各方面的有关单位都知道是我一个人执笔。这本资料获得了各方好评，一重基建处李海旺处长也很高兴，有人对我说：“李处长很器重你。”由于处长的器重，也减少了同事们对我的歧视。

下放劳动当电工

1959年秋，厂里集中全厂的右派到工厂西边的农场劳动。李海旺处长以有利于工作为由，向厂党委要求让我在基建处下属单位劳动，得到了同意。所以，有人说我是“右派中的特殊人物”。在基建处筹建的水泥车间劳动时，没有电气技术人员和电工，我当了电工，晚上自学电气专业的书籍，以及几部《电气工程手册》，使我又掌握了电气专业，高、低压都搞了。此后遇到工作需要，我先后完成了4个高低压电气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在全厂一千多名技术人员中，我成了唯一一位具有机械、电气跨专业能力的人，而且对热工仪表和筑炉方面，我也具有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多面手了。

□ 我与清华

在清华毕业前，给我工作考察的时间是一年半，从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底。但直到通过体力劳动，1961年11月才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资也没按文件执行，1962年4月才由生活费29.5元增加到工资49.5元，比其他本科毕业生低了一级，我一直都不敢申诉。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参加了工会，编入民兵连，但是又称为“摘帽右派”。

1959年9月，因与冶金部机装十公司在适用预算定额问题曾到京请示一机部和冶金部，一机部基建局自此逐步对我在机械设备安装定额方面的技术水平有所了解。1963年初，国家计委布置，由一机部和建工部编制《通用机械设备安装预算定额》。一机部发文《关于抽调人员参加编制〈通用机械设备安装预算定额〉的通知》，点名要我参加，因此我有机会到北京工作了近两年。

“文革”中在砖厂“发光”

1966年“文革”来了，我在设备动力处设计科努力画图，前期平安度过。1967年与我的贤妻结婚。可是下放劳动还是少不了我。1968年末，下放到车间当除灰工。1970年初，又下放到离厂15公里的厂属三里岗农场。我给农场设计施工了高低压电气。年底因为修地道要用砖，厂武装部出面把我借回，给家属五七综合工厂建砖厂。1971年元旦后，我们开始在厂西南角围墙外建砖厂，包括总平面布置、机械电气设计和施工，当年建成投产生产了500多万块红砖。1972年初，我被评为1971年度厂级（省军级）先进工作者。我的人生开始“发光”了。

砖厂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主要靠我，1973年春，我被任命为400多人的制砖工段副段长，当时都按军队编制称为副连长。在“文革”中，这是很破格的。进入领导层后，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一重厂适应知识青年返城开办集体企业，我被任命为工业公司副经理，成了副处级干部。

拨乱反正 恢复名誉

《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30页载：“本校共有57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教师222人，学生349人。在贯彻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后，经复查全部改正。”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1979年2月23日《关于张哲荪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张哲荪同志，原为清华大学机械系制71班学生，共青团员。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定为右派分子。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精神，我们对张哲荪同志的原划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张哲荪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销原开除团籍的处分决定。”

右派改正，不叫平反，不补发工资，只给予补助，给我补助了900元。22年多的另类处境，政治方面的问题宣告终结，可经济方面曾经克扣的两级工资没有补齐。

1982年12月，我调到了石家庄市水泥制品厂。我调去后从事白水泥生产线设备机械电气设计的审核工作。1983年4月，我被任命为第一副厂长。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正后任厂党委委员。我是先“当官”后入党。我班在校时打了五

名右派，后来其中的三名入了党。

劳务出口伊拉克

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90 公里的苏维拉砖厂，是投资 4600 万美元由西德包建的年产 2 亿块空心砖的砖厂。全厂 160 余人，伊方 50 余人负责经营和厂区卫生。从 1982 年开工，国家建材局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建材局，由其从所属各企事业中选派 111 名职工组成中国技术组，负责生产和设备维修。1985 年，苏维拉砖厂燃油隧道窑窑顶着了一把火，伊方解雇了中国技术组组长，这才派出我这个具有机械和电气跨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担任中国技术组组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 1986 年 5 月到伊，到了苏维拉砖厂后，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过度疲劳，自称“发洋财，受洋罪”。

我在清华上学时全面学苏，学的是俄语，但我高中上的是天津新学中学，英语和数学是英国老师教，课堂上全用英语。所以在通用英语的伊拉克，我结合《汉英词典》，两个月后就不靠翻译了，方便和促进了工作。

苏维拉砖厂在伊拉克砖公司系统 26 个砖厂过去评比中没上过名次，在我任中国技术组组长的 1987 年获评第一名，伊方厂经理和中国技术组都获了奖。1988 年 4 月我回国前，伊方在印有伊拉克国徽的表彰信中写道：“对于你非常努力、非常出色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河北日报》曾以《他们为祖国和河北争光——石家庄建材技术组在伊拉克工作记实》为题作了报道。这是我人生的

又一次“发光”。

晋升正高职 研制新产品

我回国后的第二年即 1989 年，河北省首次评聘正高级工程师，因我在国外获得的表彰和国内 30 多年的工作业绩，顺利地晋升为正高级工程师。1990 年，我调入石家庄市建材工业设计研究所任所长兼党总支副书记。我在企业干了快一辈子，临退休时调到了事业单位。我的工资被克扣了 32 年，直到评上正高工后，才赶上了同年资的正高职。

之后，我应聘担任过“河北省建材高级工程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科研项目的鉴定委员会委员，还参与指导清华大学土木系建材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论文。我经常出席建材方面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1993 年 7 月，我退休了，开始了发挥余热的历程。我先后担任过石家庄市建委建设科技推广服务中心总工程师、石家庄市利爽保温材料厂总工程师。先后完成了科研项目 7 项，其中获河北省建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在石家庄市利爽保温材料厂，我们研发出一种附加值非常高的新产品，2001 年正与德国洽谈出口之际厂领导出了车祸，厂长重伤，副厂长身亡，我虽任总工，却已年届七旬，无力主持生产试制，功亏一篑。

暮年创作 研究文史

我从 73 岁开始写作社科文史类文章，发表了《张之万之最》《高阳出了个李石曾》《中苏美关系与〈别了，司徒雷登〉》《追思“三钱”》《三十年前在伊拉克》

□ 我与清华

等近 20 万字的作品。

之所以研究张之万，是因为我是他的曾孙。我没有继承过张之万的物质遗产，只有潜移默化的精神遗产，包括张氏家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遵先代三尺遗言克勤克俭。”我终生身体力行。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朝入阁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二人。清朝以大学士为宰相，张之万、张之洞都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三大名科之一，因这一科考中了张之万、李鸿章、郭嵩焘、沈桂芬等名流进士。而张之万出类拔萃，文采压倒众名流，高中状元。张之万绘画、书法、文章、赋诗、楹联

皆精，与著名画家戴熙并称为“南戴北张”；书精小楷。2011 年，为纪念张之万诞辰二百周年，由我主编，在天津外语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 23 万字图文并茂的《状元宰相张之万》史册。

2008 年，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评我为“优秀老干部党员”，我成了实至名归的左派，是我人生的又一次“发光”。

同学们说我老运不错。的确，秉承孝悌家风，夫妻和谐，子女孝顺，儿子在大型企业集团担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女儿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任副教授。我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读书、看报、上网、听京剧、写文章，贻养天年。

2015 年 9 月 9 日

我的清华缘

○李作仁（1961 自控）

1958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被抽调入清华大学学习。因此，我就成为半路有缘进清华的幸运儿。

天大喜事从天降

1958 年秋天，我们正在西安郊区农村劳动。一天学校里来了位骑摩托车的人，找到我说有急事让我回学校，我就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回到学校。我感到很纳闷，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一路上忐忑不安。回校后马上在校长办公室开会，与会者有二三十人，这才知道要调我们到清华大学学习。

听到这话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吧！可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讲得很具体，而且要大家在三天之内办好离校手续前往北京。在办离校手续时我还遇到了一件难事，我借图书馆的一本书找不到了，要以书价的三倍赔偿，这对我这个从甘肃农村来的穷学生可是个大难题。后来怎么凑齐这书钱也早已记不起了。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清华园。

喜忧参半进清华

当时火车速度很慢，从西安到北京需一天多，一上火车随着火车的哐当声很快